

衣冠之治的解體和民族意識

◎ 劉志琴

以倫理為本位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最廣泛的凝聚效應，大至意識形態全國一統，小至最尋常的事物，人們的穿衣戴帽也予以禮制化的形態，形成衣冠之治的傳統。一身衣衫從質料、色彩、款式、花紋滿載着天道、倫理、身分地位和品格情操的諸多含義，充分體現了生活方式、倫理道德和等級序列三位一體的文化模式。所以衣冠的倫理政治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性的特徵，它塑造了中國人的外形，也制約了中國人的心靈。衣冠之治的解體和個性解放息息相連，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特有的國情和民情。

衣冠之治的廢弛和新的人生價值觀的萌動相應相生，並不是偶然的現象，個性的蘇醒是以人生的欲望而啟動的，欲望的擴展又必然要沖決禮制的設防，早在十七世紀後期的這種景象已具有社會啟蒙的色彩^①，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更是表現出追求個性解放的鋒芒。

衣冠的倫理政治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性的特徵，它塑造了中國人的外形，也制約了中國人的心靈。衣冠之治的解體和個性解放息息相連，是中國走出中世紀特有的國情和民情。

移風易俗從放足、斷髮、易服發難

鴉片戰爭以後，社會觀念的一大變化，是人們痛感到民智不開是中國積弱的一個重要原因，欲啟民智，必先革除惡風陋習對人民的禁錮，其中尤以鴉片和裹足成為摧殘民體，有辱國格的兩大公害，先進的知識分子莫不對此口誅筆伐。如果說禁煙尚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比前者對社會的震撼面更為寬廣，其意義也更為深切。

反對裹足，廢除各種摧殘婦女的纏足鞋、弓鞋，這是對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強體、實用的觀點看待人們的衣冠鞋履，勢必要推動對服飾的改革。早在百日維新期間康有為上書〈請禁婦女裹足折〉和〈請斷髮易服改元折〉，認為女子裹足，不能勞動；辮髮長垂，不利於機器生產；寬衣博帶，長裾雅步，不便於萬國競爭的時代，請求放足、斷髮、易服以便於「與歐美同俗」，這就把變衣冠作為學習西方文明的一項重要內容，具有啟發民智的意義。

斷髮易服到二十世紀初隨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發的群眾運動。長辮和滿裝雖然已經沿襲三百年，但這一使漢人屈辱的記憶並未消失，尤其是譏為「豚尾」的辮子，被人們視為民族的恥辱。當革命的矛頭指向滿清統治的時候，斷髮易服成為動員民衆支持革命的最有力的召喚。剪辮子成為中國人的盛大節日，許金城《民國野史》記述：「無數的漢人都興高采烈地剪去這條奴隸標誌的辮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選擇吉日，拜祭祖先，然後莊重地剪除，把辮子燒了。更有聯合多人同日剪辮，並燃放爆竹，舉行公宴慶祝的。」《申報》(1912.3.20)在「自由談」中記述服裝的大改大易說，「新禮服興，翎頂補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雲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子帽滅，愛華兜興，女兜滅，天足興，織足滅，放足鞋興，菱鞋滅。」變衣冠促進了移風易俗，使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生活方式國際化的起點

剪辮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導下的風俗改良，不同於歷代改元易服之舉，歷史上的變衣冠所變的是形制，不變的是倫理性和等級性。民國初年頒佈的〈服制〉，規定官員不分級別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為大禮服，這是對封建服式的徹底否定。真正結束衣冠倫理政治化觀念的，是孫中山提出的服裝製作的四原則，他在覆中華國貨維持會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推廣服裝的圖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點在適於衛生，便於動作，宜於經濟，壯於觀瞻。」^②這就使人人須臾不可離身的服裝，擺脫倫理政治的規範，向着便於民衆生活、實用、經濟、美觀的方向發展。淡化政治倫理對消費生活的干預，是倫理的變革，也是服裝史上的重要轉折。

這樣一個在世界通行的服裝近代化的觀念，得以在中國迅速傳播和實施，與其說是由於觀念的變革，不如說是打開國門後，洶湧而來的洋布、洋裝、洋貨的衝擊，在中國引起的回應。從十九世紀50年代以後，洋貨傾銷中國最多的要數洋紗、洋布、洋火、洋油，都是有關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僅衣著用料就有洋布、洋綢、洋緞、洋呢、洋羽毛、洋漳絨、洋羽線、洋被、洋毯、洋花邊、洋手巾等等^③，琳琅滿目。它們以價廉物美的優勢佔領中國市場，以上海為例，1871年進口洋布1,300萬匹，1899年增至1,700萬匹^④，這樣大量的傾銷，導引人們的消費習慣發生變化，細密光澤的洋布成為人們時尚的用料，進入家家户户。衣料質地的改變也促進了衣服款式的變化，輕便合體的洋服逐步贏得中國人的歡心。十九世紀末穿洋裝的尚是鳳毛麟角，到二十世紀初廣西梧州中學在歲時令節已經容許「學生披洋衣揖孔孟」^⑤。使洋裝突飛猛進發展的，是在民國初年男剪辮、女放足之後，隨之興起了洋裝熱，與洋服配套的商品應有盡有，各種洋貨充斥市場，助長了崇洋思想的泛濫。

本來，民主制度的確立，激勵了人們對西方民主社會的嚮往，人們痛恨封建統治的腐敗，更加醉心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的理想，認為由這種理想建立的西方生活方式代表人類前進的方向，誰接受西方習俗，誰就是文明維新，否則就是冥頑不化。洋裝成為西方文明的象徵，被人們推崇備至，有的宣揚說，西

如果說禁煙尚是對少數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對裹足卻要變更上千年的陳規舊習，波及千家萬戶，比前者對社會的震撼面更為寬廣，其意義也更為深切。

左圖為民初革命軍為百姓剪辮子。右圖為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從斷髮到穿中山裝，反映了衣冠之治的解體。



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踔厲，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隸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強種云云^⑥。這樣肆意誇大洋裝的心態，反映崇洋已成為洶湧的社會思潮。

然而，社會實踐的結果是，洋裝在中國的流行，並未取代中國的服裝，而是促成了中國服裝的改良。中山裝的出現，就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它以西服為模本，改大翻領為立領，五扣，外貼口袋。女性服裝一改滿裝的寬大直筒式，依照西方流行的人體曲線美加以裁制，演變為今日之旗袍。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價值和審美習俗，結合中國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 new 服式，這是西體中用的最成功之作。所以二十世紀初的崇洋雖然不是民族自尊的意識，但是生活方式上的洋化傾向，又導向生活方式的國際化，這二律背反的現象有利於突破中外生活方式的差異所形成的壁壘，也利於文化的交流和創新。

中山裝和旗袍都是沿用西式服裝的價值和審美習俗，結合中國的某些形制而創作的 new 服式，這是西體中用的最成功之作。

展現個性自由的窗口

衣冠的倫理政治化所表現的是群體性的等差，它在個人服飾的造型上又必然是以群體性為其普遍性的特徵。不論穿著的個性千差萬別，只要在社會上隸屬那等次，就必須遵循那個等次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穿著與那個等次相應的服飾。衣著的群體性正是傳統文化中崇尚群體、貶抑個體的表現形式。

辛亥革命的成功結束了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以民權、平等為核心的民主主義思想取代封建思想體系，在我國社會生活中佔有了主導的地位。這一指導思想的確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終結，生活方式、倫理道德、等級序列一體化的結構解體，服飾消費不再具有身分倫理的限制，還歸人民生活的自由選擇。雖然民眾因為擁有財富的多寡不同並不能真正有選擇的自由，但是以金錢取代權力的支配地位，進入商品市場，進行等價交換，是人們擺脫身分地位的約束，所能獲得消費的最廣泛的平等權利，這給個體自由在服飾領域的施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從封建社會向民主社會的過渡中充滿了前進與倒退、革新與保守、崇洋與復古的矛盾，各種社會勢力又往往在穿著打扮上來表現自己的傾向。西裝革履，長袍馬褂，袒胸露背，長靠短打，新舊土洋，千奇百怪，與其說是政治風雲的映照，不如說這已開始了服裝自由穿著的時代，作為人民大眾更是期待這種自由生活的到來。

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們都把安排生活的自由視為個體自由不可分離的一部分，這是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個性解放的呼聲一浪高於一浪，與商品大潮的衝擊相呼應，驅動人們的生活欲望噴薄而出，合理的不合理的浪疾潮湧，社會風貌為之一變，服裝得風氣之先，成為社會風尚變遷的先導。

當時的報刊記述了這樣的景象：「中國人外國裝，外國人中國裝。」「男子裝飾像女，女子裝飾像男。」「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⑦「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⑧「洋洋灑灑，陸離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給。」^⑨這些時裝的帶頭人竟然是被道學家們視為低賤的妓女和藝人。一篇名為〈粵女學生之怪裝〉的文章說，服裝「日變古怪」，「其始不過私娼蕩婦所為，繼則女學生紛紛效法。」^⑩另有說：「婦女衣服，好時髦者，每追蹤上海式樣，亦不問其式樣大半出於妓女之新花色也。男子衣服，或有模效北京官僚自稱闊者，或有步塵俳優，務時髦者。」^⑪甚麼貴賤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別，統統消失在追新求異的時裝潮中，在近代文明所到之處，衣冠之治的影響蕩然無存。服裝成為一個窗口，展現了中國人性解放的千姿百態。

服裝「日變古怪」，「其始不過私娼蕩婦所為，繼則女學生紛紛效法。」甚麼貴賤之等，夷夏之辨，男女之別，統統消失在追新求異的時裝潮中。

極左思潮與服裝意識形態化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極左思潮又召喚了衣冠之治的復蘇。階級鬥爭的理論管人管事，管天管地，又管上人們的穿衣戴帽，造成服裝的意識形態化。建國後學習蘇聯老大哥，推行一邊倒，在社會生活方面的直接後果是人人穿上列寧裝，不分尊卑貴賤，也不分男女老少。群體性擴展到極致，消失了年齡和性別的差異，一律藍色衣冠，因而被譏為藍蟻之國。如果僅僅把列寧裝看成服飾的變革，那就低估了它在民族心理深層價值觀念的重大變遷。人們以趨同的心理表現親蘇、親共的政治態度，自覺不自覺地追隨服式一律，共產黨到哪裏，列寧裝就流行到哪裏。全國是大鍋飯，全民也就着列寧裝。政治價值更勝於服裝的護身、裝飾功能，成為立場的顯示，革命的表徵。愛打扮的幾乎都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或小資產階級情調，受到蔑視甚至遭到批判。這種輿論導向女性服裝男性化，連那些正值青春花季的少女穿一件花襯衫，也常常單件藍、灰、黑的外衣。這種看來似乎是自覺的選擇，正是基於心理不自覺的壓抑，這才是對個性的真正抹煞。在人作為階級鬥爭工具而存在的極左思潮中，以服裝衛道是一件不足奇怪的事。

如果說50年代服裝的意識形態化還是以政治上的從眾，為人們趨同的話，那麼到60年代後期卻是以一場風暴在服飾領域進行了專政。十年浩劫是以破四舊開場的，破四舊中震動面最大的，是在街頭巷尾攔截行人，剪頭髮、剪褲

腿、抄家、示衆，稍有異議的便橫遭咒罵甚至毒打。即使在清初，統治者用留髮不留頭脅迫漢人投降，也還有男降女不降，老降少不降，生降死不降的容留，而除四舊所到之處，留長辮的、燙髮的、小褲腿的幾乎絕迹。用恐怖手段取締某些髮型和服裝，比中世紀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以說封建時代衣冠的倫理政治化到文革中惡性發展到登峰造極。直到80年代初，打開國門，牛仔服、迪斯科初臨中國之際，有些地區又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口號下，再次發生剪褲腿，圍剿迪斯科的情況。凡是極左思潮肆虐的地方，人們連穿衣戴帽也不能自由選擇，穿甚麼、怎樣穿，成為政治風雲的晴雨表，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

真正結束這種情況的是當代層出不窮的時裝潮，尤其是文化衫的走俏，顯示着追求個性化是當代青年的時髦，這是商品經濟大發展從內心到外形催動着人們的一個值得注意的變化。改革開放的洪流衝擊了極左的堤防，正在掀翻高壓在民族心理上的磐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調動的競爭機制，為個性的發展提供了各種機遇。新舊更替、中外激蕩、變化多端的社會景象，給人們帶來了興奮、追求、失落和迷惘，敏感的年青一代暢開心扉，坦露自己的喜怒哀樂，因此反映各色情緒的題字：「我是一只小小鳥」，「一無所有從頭再來」，「我很醜但我很溫柔」，「天生我才必有用」，「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浪漫人生」，「老實巴交」，「不會來事兒」，「拖家帶口」，「小貓小狗」，「煩着呢，別理我」等等俚言俗語、歌詞、圖象赫然出現在胸前背後，這又何嘗不帶有個性解放的色彩呢？80年代人的主體性覺醒，是以渴求自我價值的實現作為個性解放的潮流，當這思潮一度沉抑以後，又以隨心所欲的嬉皮頑笑抒發自己的心懷，從自我實現到自我調侃，難道不是個性解放變態的發展嗎？雖然時尚有時也會導引民衆的服飾趨向同一，使個性淹沒在群體之中，但這是與政治意識無關的市場心理，個性並不凝固，變化呈現周期性的流行，表現出變動不居的態勢。只有當服裝不再受到政治的干預，按照人們的生活情趣、審美風尚、經濟條件，隨時隨地隨心地滿足各自的需要，那色彩斑斕，個性紛呈的時裝潮就會連翩而至。這是一段路程的終點，也是一個新起點的來到。

人們以趨同的心理表現親蘇、親共的政治態度，全國是大鍋飯，全民也就着列寧裝。政治價值更勝於服裝的護身、裝飾功能，成為立場的顯示，革命的表徵。

註釋

- ① 參見拙作〈晚明城市風尚初探〉，《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
- ② 《孫中山全集》卷2。
- ③ 《盛世危言》卷3，《商戰》。
- ④ 參見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卷2，頁239。
- ⑤ 〈胡漢民自傳〉，《近代史資料》81年第2期。
- ⑥ 參見〈剪辮易服〉，《湖北學生界》第3期。
- ⑦ 〈自由談〉，《申報》1912年3月20日。
- ⑧ 〈閱評二〉，《大公報》1912年9月8日。
- ⑨ 〈自由談〉，《申報》1912年9月14日。
- ⑩ 《大公報》1913年6月15日。
- ⑪ 《中華全國風俗志》(三)，下篇卷3，江蘇。

劉志琴 1960年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及文化史研究室主任。